

让村民自己的公共卫生组织落地生根

□□ 刘振远



据多家媒体报道，“2020年底北京基本实现所有村(居)委会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山东推进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立公共卫生委员会”“肥西县启动村级公共卫生委员会建设”……2018年以来，全国多个省份和市县开始在村民委员会下设公共卫生委员会，以协调处理农村的公共卫生事务。这是完善村民委员会机构职能、推进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也是推进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夯实基层公共卫生基础的关键举措。

我国宪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也规定：“村民委员会根据需要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等委员会。”设立村民委员会，是贯彻落实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补足长期角色缺位的村民自己的公共卫生组织的关键改革。此次改革之前，多地采取若干名村干部兼职卫生管理员的方式，协助村民委员会管理村内公共卫生事务。但是，以兼职的方式，不但难以将公共卫生工作做深做实，也不易协调各方公共卫生资源与力量。面对近年来农民日益增长的公共卫生需要以及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启示，设立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可谓正当其时、点睛之举，将有利于

与过去“兼职”相比，设立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一方面，实现了专事有专人管、专责有专人担，一事有内行干、一事有合力办；另一方面，能更精准地满足村民的公共卫生需要、更真实地反映村民的公共卫生呼声，让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更加贴合实际。

进一步织牢织密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网络。

与过去“兼职”相比，设立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的进步不言自明。一方面，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部分成员是专职的，同时吸纳乡村医生、农村党员、村民代表、自然村(组)卫生监督员等加入进来，并协调乡村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共同参与，既实现了专事有专人管、专责有专人担，又实现了一事有内行干、一事有合力办。另一方面，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是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设立是对县乡村三级公共卫生体系的补齐。村民自己协商决定本村的公共卫生事务，并对政府相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既能更精准地满足村民的公共卫生需要、更真实地反映村民的公共卫生呼声，又能让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更加贴合实际，从而提高公共卫生政策效能，降低公共卫生治理成本。

目前，设立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地方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改革成果，总结出一些工作经验，但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一些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办公设施、专业设备没有落实到位，一些参与这项工作的村干部专业能

力不强、服务水平不高等。诚然，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是一个新事物，在努力探索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在所难免。但是，也要清醒认识到推进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不我待，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特别是参与其中的村干部得加紧锤炼工作本领，政府相关部门也要再帮上一把、送上一程，以实现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机制更加健全、成员更加得力。

首先，要保障物质装备条件，提升专业化水平。得把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需要的场地准备到位、需要的人员配备到位、需要的装备购置到位、需要的资金拨付到位，千万不能把这项改革变成“无米之炊”“有名无实”的政绩工程。农村公共卫生治理对于专业要求较高，得加强对于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成员的业务培训，想方设法引进专业人才共同参与，同时建立常态化业务指导机制，提升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的专业化水平和服务能力。

其次，要让村民积极参与进来。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是村民自己的公共卫生组织，农村公共卫生治理也是村民大家伙儿共同的事。因此，得建立健全

工作机制，让村民的意见建议、心声呼声能通过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形成村规民约等，实现村民自己的事自己管。此外，还应探索完善“积分制”、卫生监督员等制度，健全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与网格管理员、自然村(组)干部、农村卫生室等的联动机制，让村民自发自愿地投入到公共卫生治理中来，做到一有情况及时响应、多措并举、群策群力、联合出动。

再者，要加强与农村相关工作的有机结合。农村公共卫生治理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搞好公共卫生还需要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推广绿色的生产方式、培育文明的生活习惯等。因此，要把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的工作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绿色技术推广、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干一项工作能牵动两三项公共事务。

最后，要做好政府公共卫生治理的帮手。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应带着政府共同织牢织密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网络。因此，应完善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同县乡两级公共卫生管理机构的联系机制，做到村情民情及时上传、政策举措及时下达，将公共卫生体系的触角真正深入千家万户。

村民公共卫生委员会能否真正发挥作用，密切关系到深入实施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战略。因此，在探索过程中，有好的机制、做法要及时总结出来，遇到困难、问题要赶紧研究破解，以实现村民自己的公共卫生组织真正落地生根。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历来极为重视三农工作，自2004年开始，至今已下发18个中央一号文件，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当前，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笔者认为，新时期我国三农出现新的情况、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也面临新的形势，值得关注。

一是农村经济难题。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政策导致农业经济链条设计中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农民分享农业产业的利润较低。通过对福建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的评估表明，农民每公顷农地创造的价值达到18.33万元，但当下经济链条只兑现其中的农产品价值为9537.19元，占其创造总价值的5.02%，即使兑现其“旅游服务价值”的9071.59元，两者相加也仅占总价值10%左右。实际上，农民所创造价值的70%左右都集中在水土保持，如果这部分价值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评估和兑现，那么我国农村经济难题就会得到大大缓解。

二是农村环境难题。既然现行的经济链条只计算农产品数量价值，那么农民对耕地使用就会为了短期的产量收成而投入大量的化肥、农药等，就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土壤退化、地下水污染等。

三是农村社会难题。人口和双重“二元”体系(即对城市与乡村、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从社会和生态两方面引发农村在食品、经济、环境和教育等方面交织的矛盾，其中核心是农村教育资源严重缺乏。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方针，使新时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更加清晰和具体化，即以全面建设乡村生态文明社会为抓手，一揽子解决新时期我国农业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交织的难题。不管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考虑，解决三农问题、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一门能涵盖自然、经济和社会知识的学科或科学来指导，这门学科就是源于系统思维和跨学科方法的生态学。理论上，生态学是研究生物(包括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相互间关系的学科或科学。现代全球人口、粮食、资源、能源和环境五大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加剧都源于割裂生物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实际上，生态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长期的“二元”经济政策恰恰是造成三农难题的根源，单凭一门经济学的指导是解决不了的，需要打通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藩篱。本质上，生态学是自然界的经济学，它刚好克服了当下主导全球经济发展格局的新古典经济学把自然和环境价值排斥在其创造的市场经济体系之外的缺陷，把后者重新纳入人类生产和消费循环体系中。

在生态学视野中，乡村振兴的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可持续的乡村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具有生物等级和景观尺度特征，乡村振兴就是要循着生态学的“等级与尺度思维”，自上至下处理好乡村生态系统各个尺度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第一层次是均衡城乡居民数量与比例。人多地少，生产者多消费者少，是目前中国乡村的自然和社会资本双重制约因素。城市消费者主导了买卖关系，农村生产者的收入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收入，这是农业效益低的症结所在。因此，农村城市(镇)化之路是必然的，其目的在于尽快减少生产者数量。目前，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镇)化阶段，应采取以前在工业化进程中城市(镇)化没有及时跟上的政策(监管)教训，让城市(镇)主动“拥抱”进城农民，让城市(镇)化成为化解三农难题的根本途径，避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镇)化过程中伴生的城市居民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和城市环境污染加剧等不良后果。

第二层次是对乡村及其农业的价值观进行根本变革。1996年，加拿大农学家克劳德·考德威尔博士重新定义了“农业”，他说“农业”是“把太阳光转化为人们健康、幸福生活的科学、艺术、政治学和社会学”。农业是地球上唯一有生命的产业，事关人类的健康、幸福和可持续发展，即农业不仅仅是“经济学”，不能以货币作为其价值的唯一衡量标准，要用“生态学”原理构建“和谐”的人类与自然、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从“政治学”的高度通过适时调整产业政策以保护乡村及其农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兑现农民的劳动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要紧紧围绕“生态”建设主轴，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比如通过创新农业生态补偿机制，构建政府、社会和市场等多方融资通道，兑现农民创造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逐步恢复农民在乡村发展的主体地位。

第三层次是对农业组织形式的变革。一是建立健全农村(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尽可能地让生产者分享整个农业产业链条上的利润；二是大力发展社区支持农业，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促进两者的互动、互信、互助。社区支持农业也是一种低碳的“地方性消费”模式，通过提倡消费者购买当地生产的食品，可以有效减少食物长距离运输过程中的化石能源消耗，限制乃至消除农产品从土壤到餐桌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典型低碳消费模式，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兑现对国际社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之道。

第四层次是对农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的变革。运用生态学的“食物链”与“生态金字塔”原理建设生态农业，使农业各环节有效“接口”，前一个生产环节的“废弃物”成为下一个生产环节的“资源”，最终实现废物或自净的农业生产体系。

第五层次是对食品生产技术的变革。简言之，就是回归中国传统农业的有机或无公害耕作方式，重建农村生物多样性体系，利用物种之间的相生相克机制，维护土壤肥力和有害生物的综合防治，有效减少化肥和农药施用，保障食品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对上述乡村生态系统各个等级尺度的认识必须按从上到下的重要性递减顺序进行，切不可倒过来。其中，均衡城乡居民人口数量与比例和对乡村及其农业的价值观进行根本变革并列最高的认识层次；对农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和对农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的变革依次处于中间的认识层次；对食品生产技术的变革处于最低的认识层次，其包括有机农业和无公害耕作，实际上是我国两千多年传统农业的一贯做法，回归它们也仅仅是一个技术和手段问题。

(作者系福建农林大学农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生态农业与生态文明转型研究中心主任)

乡村建设迫切需要生态学视野

王松良

把APP“适老模式”做到老年人心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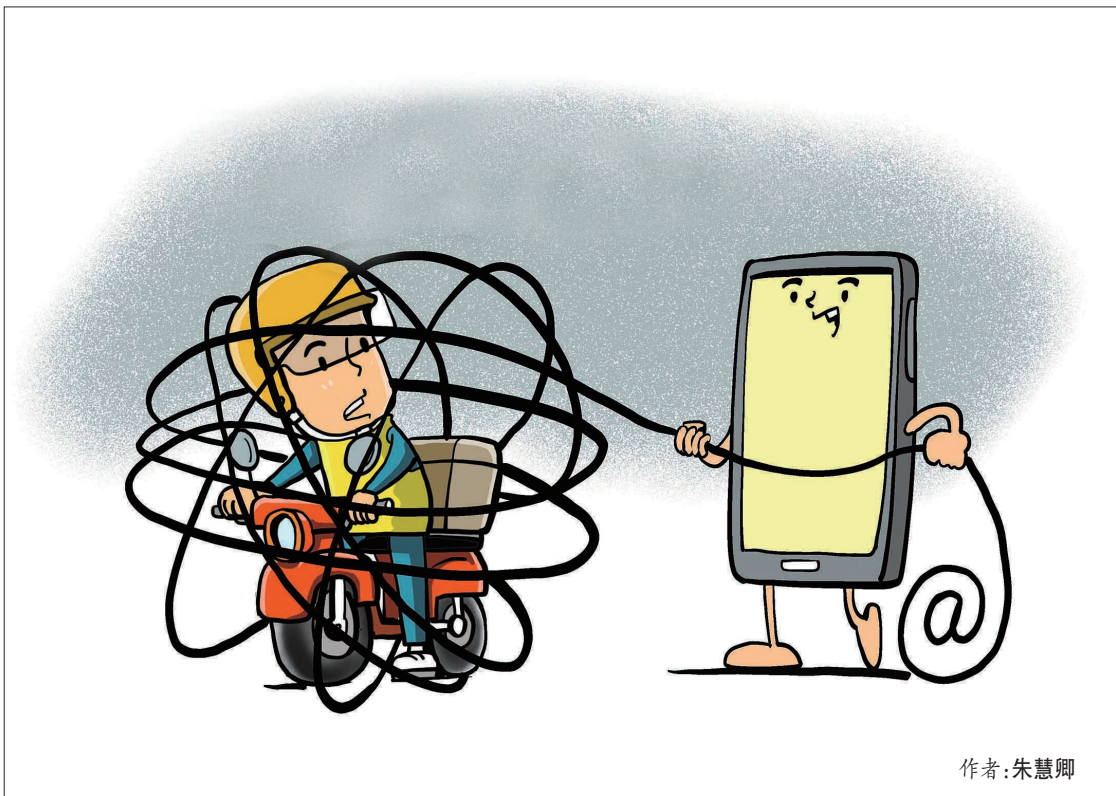
□□ 江文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老年人与信息化社会之间的鸿沟有扩大之势。医院里，因为不懂预约挂号和自助缴费于着急；餐厅里，因为不会扫码点单只能求助服务员……各地各部门关心关爱老年人，提出对同老百姓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APP进行适老化改造，推出“适老模式”，以此给老年人带来更多科技获得感。

“适老模式”主要针对老年人群体，自然应该聚焦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痛点”“堵点”问题。比如根据老年人大多视力不好问题，让字体变大，方便阅读；又如根据老年人记忆力不好的问题，要通过删繁就简，让经过适老化改造的APP操作简单。但让人遗憾的是，不少APP的“适老模式”，只是“看起来很美”，老年人不会用、不想用的情况还很明显。

有媒体记者称，部分APP的“大字版”浮于表面。比如进入某APP“长辈模式”，字体变为正常模式下的两倍大，但是这种放大的字体只出现在首页，点击进入“缴水电费”“充值费”等二级界面后，界面的布置、字体却与正常版一样。部分APP的适老版需要进入特定的小程序才能运行，并不能真正解决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痛点”“堵点”问题。

要让“适老模式”接地气，满足老年人的需要，既需要相关企业打开大门，去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根据老年人的需要为他们量身定做；也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加强监督，督促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把“适老模式”做到老年人的心坎上。此外，相关部门也要对敷衍塞责的企业进行批评教育，及时改正问题。这对“适老模式”的叫好叫座，大有益处。



作者：朱慧卿

目前，我国网约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超过2亿。目前，国家正在制定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拟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力争尽早地解决职业伤害保障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同时，要求平台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不得通过算法等手段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还要求规范平台企业的经营行为，针对网约车平台抽成比例过高问题，要求平台企业规范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加强与驾驶员之间的沟通协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向社会公布。

这正是：

灵活就业超两亿，新型职业新课题。
国家出手重保障，多方规范维权益。

文/铁锤

数字红利也要惠及“95后”农民工

□□ 谢军

络配送员、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新职业涌现，并为社会所认可与尊重。身处数字科技时代，“95后”农民工渴望获得数字化技能，有着求职谋生的现实需要。而且，城市也因为他们留下来开了一扇门：只要能够通过职称考试，就能成为新市民。有了机会，新生代农民工为什么不去试一试呢？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技能，让人才更优秀。在“95后”农民工渴望培训的背后，也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提升自我的人生追求。他们深知自己知识技能的不足及差距所在，通过培训获得一技之长，就不用为生活大过培训了。或许这样难以成为方家，也无法弥补学历缺陷，却不至于被“机器换人”，被时代淘汰。实际上，数字科技赋能，远不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注入动能，也是应有之义。而为“95后”拓展人生上升的空间，却是科技赋能基层

治理的生动诠释。伴随着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科技红利惠及“95后”农民工更应得以彰显。

普及数字化技能培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问题与困境也要认真对待。“95后”农民工虽是网络世界的“原住民”，但却受限于学历水平与认知能力，较难成为真正的行家里手。基于此，“95后”农民工不仅缺少竞争力加入晋升、跳槽的队伍之中，也面临着职业风险高、劳动强度大、保障水平低等现实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无论是保障新就业生态劳动者，还是改变被固化已久的刻板形象，都要整个社会主体的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外部驱动；而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在自觉。透过这份报告，我们看到了“95后”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了解了他们对自己提升的强烈诉求；而报告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呵护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也要为之创造提升自我、改变自我的机会与氛围。实现这些，保障共享数字科技红利“一个都不掉队”，将其纳入其中，也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设定了“普遍、普及、普惠”

的目标；《农民工稳就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同样提到，要面向广大农民工群体，开展大规模、广覆盖和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这些利好政策，为“95后”农民工共享数字科技红利提供了保障，也为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依据。

技能是立身之本，也是自信之源。“95后”农民工的技能提升，相关部门的牵头组织、强力支持，企业等多个社会主体的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外部驱动；而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的内在自觉。透过这份报告，我们看到了“95后”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也了解了他们对自己提升的强烈诉求；而报告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呵护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也要为之创造提升自我、改变自我的机会与氛围。实现这些，保障共享数字科技红利“一个都不掉队”，就要外在的驱动与内在的自觉双向发力。

推动农村客运由“开得通、走得了”向“留得住、通得好”转变

□□ 胡建兵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舒适、经济的农村客运体系，农村交通出行条件显著改善，农村地区基本出行服务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客运可持续发展机制基本建立。

农村客运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农民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基础和保障工程。近年来，我国农村客运事业持续快速发展，到2020年8月底，全国具备条件的3.1万余个乡镇和54.3万余个建制村全部实现通客车，形成了遍布农村、连接城乡、纵横交错的农村客运网络，农民群众“出行难”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目前农村客运还存在道路基础设施不完善、通达深度不够、经营行为不规范、安全管理不到位、发展不平衡、长效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等问题，城乡客运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我国农村人口占比大，发展农村客运，让农民群众坐上方便车、经济车、安全车，不仅能解决

农民群众出行问题，还有利于加强农村信息传播和对外交流，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不仅有利于强化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综合效益，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村生产发展，而且有利于加强城乡沟通，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城镇化进程，改善村容村貌，促进乡风文明。因此，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

农村客运是沟通乡村和城市不可或缺的“桥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经济正在加速发展，大量的购销人员往返于城乡之间，农产品外销创收已成为农民群众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也大大增加了人员出行的需要。推动农村客运高质量发展，加快农村客运网络建设，形成畅通的客运体系势在必行。各地应当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结合当地实际，尽快制定实施细则，切实增强紧迫感、紧迫感和使命感。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强化人才、资金、规划等政策保障，及时协调解决农村客运发展遇到的突出问题，推动农村客运由“开得通、走得了”向“留得住、通得好”转变，更好满足农村地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有47.14%的受访者最想学习数字化技能，26.86%的受访者想学习计算机，75.04%的受访者想从事数字化程度高的服务业……近日，一份《202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调研报告》引发热议。报告显示，相较于赚钱，“95后”农民工越来越重视自我提升，有近七成受访者渴望获得职业技能培训机会。而在诸多技能中，数字化职业技能是热门首选。哪怕自己掏腰包，他们也愿参加职业技能培训。

在数字科技时代，数字化技能是农民工求职谋生的“敲门砖”。由数字科技浪潮所形成的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服务行业进一步细化，这让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范围更广。比如，网